

中国的新经济精英：家庭历史和社会变迁

古德曼^{1,2}

(1.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国研究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2.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有关中国自1978年以来出现的新经济精英的研究总是把政治和经济因素当作最为关键的因素, 学界很少有人关注经济精英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家庭背景对于他们创业活动的决定性影响。为了探索家庭因素对新经济精英的影响, 通过在昆明、兰州、南京、青岛、太原和中山等地进行的调查, 访谈当代企业家在1979年(一般为父母)和1949年(通常为祖父母)的家庭背景, 初步的调查结果表明: 2009年出现的经济精英, 其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需要追溯到1949年之前, 这些精英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在党政机关中工作的父母或者1949年以前处于统治阶层的祖父母, 其家庭背景对于这些精英的个人行为及性格的形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市场转型; 新经济精英; 家庭背景; 家庭历史;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D 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6)02-0005-13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6.02.001

一、现象与问题

在探索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企业家的活动经常被视为社会维权行动,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一代又一代辛勤工作的社会科学家的耳边曾不时地响着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名言: “没有资产阶级, 就没有民主。”^[1] 随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又提出了比较复杂但却与巴林顿·摩尔极为类似的说法, 在有关社会多元化是民主发展之动力的论述当中, 亨廷顿明确表示企业家的活动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专业人员和管理中产阶级。^[2] 但是,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么隐含在这一概念中两者的分离便几乎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 而且地方精英在地方一级主导了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在内的方方面面。^[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进行

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加强新生的政权并削弱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别, 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 甚至进而降低了社会分化的程度^[4]: 首先是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 其目的是为了削除旧的地方精英的政治力量; 第二波政治运动是五十年代中期进行的工业和企业的国有化, 这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旨在剥夺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确保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 第三波是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 目的是对知识分子、大众媒体、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机构实行有效控制。

1978年以来, 新的发展战略的实行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中国仍然是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 独立于党政体制的社会机构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企业家和企业的经济活动也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和政府干预。^[5] 因此, 中国的民营企业难以定义, 识别也更加困难, 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比较而言, 这一概念在中国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以至政

[收稿日期] 2015-11-27

[基金项目]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探索项目“中国西部经济增长: 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DP130100600)

[作者简介] 古德曼(1948—), 男, 博士, 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西交利物浦大学教授, 南京大学双聘教授,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治的内涵。^[6]中国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要么出自党政体制内部，要么被党政体制吸收容纳，其公私融合的程度用公私合营企业家这一名称来形容是最为恰当的。^[7]在过去30年当中，很多人曾预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虽然资本家的确出现了，但他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是一个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撒列尼(Szelenyi)所描述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其中的主要受益者是干部及其子弟和技术专家。财富的分配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市场决定的，绝大部分的财富分配取决于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和占有，而这些资源和机会均由政府控制。^[8]

总之，虽然我们在过去30年里看到了地方精英的出现和定型，但这些经济精英最大的特点不在于他们独立于党政体制之外，而是他们的创业精神。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以及1984年后城市经济的开放，新兴企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随之企业家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活动范围也明显扩大。在欧洲和北美，人们对于企业家的理解侧重于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的发展，但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转型，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与企业的所有权和发展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因为1980年代初几乎全部经济资本都在党政体制之内。^[9]作为独立个体的企业家，他如要寻求资金，并建立一个企业来开发一项发明或者创新一项成果，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极为少见的。一般说来，企业家是那些懂得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经济结构的人，或者是那些私人能够看到并运用新兴的市场机遇的人。^[10]拥有充裕资金的第二代企业家只是在最近的10年中才出现，他们与改革开放初期和早期出现的、在国有或集体企业中的企业家，共谋发展。此外，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企业家都看成工业领袖，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为他们自己工作，并且保持着小规模的经济行为方式。^[11]尽管如此，这批属于新社会阶层的企业家无疑是中国新经济精英的来源。^[12]

正因为如此，任何对新经济精英现象所做的解释自然会以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为重点。政治因素的分析着重于新的经济精英与现有的党政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着眼于经济精英的利益（由于各种相当明显的原因）与现存的党政体制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13]经济因素的分析与政治因素的分析有几分相

似之处，也会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转型的程度。不过，在涉及转型过程的确切过程及后果的分析上尚存有不同的观点。^[14]

有关1989年以后在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出现的创业现象的研究同样以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分析为中心。当然，虽然，在东欧和俄罗斯出现的创业活动与中国的情况不乏类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不是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却不可否认。^[15]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存网络和体制成为新兴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依赖的可靠路径，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如此。与此同时，有关东欧和俄罗斯此阶段企业发展的研究还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在鼓励创业精神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家庭的作用不仅在相对不稳定的环境下提供了重要的关系网络，并增进互信及保障经济安全，还提供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几十年间不曾实践但明显不乏储备的创业技能。^[16]

2009年，有学者专门设计了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探讨中国的地方新经济精英出现过程中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17]。该研究关注的核心在于：过去30年间，家庭对新经济精英的兴起以及对新经济精英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与方式。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家庭关系绝非无关紧要。一些企业家和新经济精英的成员曾经是本地或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或者是领导干部的亲属。^[18]一项针对女性企业家的详细调查清楚地表明，她们的父母和公公的关系网比这些企业家自身的关系网更为重要。^[19]更早的一项针对地方干部的研究（此研究项目只涵盖一个省份）发现了一个祖孙三代传承的典型模式，即父母务农、自己从政、子女经商。^[20]对特定村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的研究同样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新通常与当地有地位的家庭的影响有关。^[21]

1990年代中期，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强调了家庭对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相互作用。^[22]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也没有引发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3]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从不考虑家庭创业的历史，也很少有人专门考察企业家的家庭背景，更别提考察企业家父母的背景和前几代人的背景了。

有鉴于此，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

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当代企业家的家庭背景去了解其家庭背景对企业家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在昆明、兰州、南京、青岛、太原和中山等六个地点展开，在每个地区访谈最富裕的一百名企业家。为了追踪代际交替和变化，被访谈的企业家所需回答的问题之一是：30年前，即1979年，他们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工作是什么？再往前推30年，即1949年，他们又在做什么？选择1949年和1979年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年份正好时隔30年，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的标志，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年份正处于社会经济开始产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因此可以视为当时社会的代表，从中得以窥见当时正在出现的社会分化。

截至目前，本研究已经完成了六个地点430个企业家的访谈。虽然实地调查研究尚未结束，但我们或许可以理出迄今的研究发现及各种可能性，以便改进下一步研究权力的社会基础的思路，同时也可以帮助解决实地调查研究过程所出现的实际操作问题。诚然，该项目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但课题组根据已经完成的研究可以得出三个可能的和符合逻辑的结论。第一，当代新经济精英的出现，其家庭背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正如过去的研究所示，新经济精英的家庭影响可以追溯到前一辈，但这还不够，研究的范围须扩大到1949年以前的家庭背景。简言之，新经济精英来源于若干有迹可寻、涉及几代人而且数量不大的家庭。这一结论自然指向第二个初步结论：当今地方经济精英的人数不成比例地来自于1949年前处于两个社会阶层的家庭，其一是当时拥有土地的旧统治者家庭，其二是当时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家庭。有趣的是，有许多经济精英的前辈同时属于这两种社会阶层。这两个结论与其他有关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流动普遍处于极低的水平方面的研究结论遥相呼应。^[24]第三个可能的结论是，特别成功的企业家均来自于特别注重自身成就和潜力的家庭。

对于上述研究，有四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负责大规模产业而且事业成功的企业家通常比较乐于谈及他们的企业和他们自己。第二，除非本人明确表示同意，否则被访者的姓名和身份一概隐去。第三，本阶段的研究不对代际交替变化的途径作任何定量分析。第四，不同地区的地方精英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该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态在地方权

力结构形成和运作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该研究选择六个地点并非因为这些地点能够代表整个中国，而是因为研究者确实期望该研究项目能够收集充足的数据信息，并以此对具体地点的具体情况作出深入分析，同时还希望对具体地点的具体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中更为普遍的现象。^[25]我们暂不讨论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便探索该项研究的初步结果。

二、地方精英与社会变迁

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结构和精英格局的历史分析通常是从“乡绅”这一概念开始的。“乡绅”一词指在封建帝国时期当地拥有土地的地方统治阶层，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封建帝国制度中最基本的结构板块。^[26]本地乡绅和帝国中央政府共同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社会系统，中央政府负责维护秩序和礼仪，乡绅虽然名义上从属于知县，但实际上却是当地的管理人员。教育系统则是把双方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其有效的培训系统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来自士绅的官员，同时，进入仕途的士绅不论在职期间和退休以后都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大的社会权力和更加广泛的影响力。^[27]乡绅在本地拥有的权威尤其是学界讨论中热门的话题^[28]，对此，费孝通的看法是：“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社区没有必要聘请外来的权威，当地的权威已经足够了。”^[29]

土地的控制方式在中国因地制宜，由于中国世袭的传统，前辈的土地通常由儿子继承，因此中国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极少。然而，虽然拥有土地是成为乡绅的必要条件，但土地并不是乡绅权威的唯一基础，他们在垄断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威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阶层。有一位学者解释得很好：“在晚清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精英通过教育和科举获取地位，依靠土地和商业活动获取财富，通过仕途获取权力，在本地获取领导职务。他们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家庭结构，拥有土地也从事商业，其亲属同时在乡镇和城市拥有住宅。精英再产生之核心便是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学者。他们一旦通过考试，就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的官僚机构的一员。一个家庭如果有人成为这样的学者，他的家人就能飞黄腾达，或拥有土地或从事商业，或两者兼顾而从中获利。”^[30]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制度，地方精英能够补充于其中，而且也觉得有必要定期补充，这对增加社会的稳定性起了不小的

作用。^[31]

1911年清朝的垮台对地方士绅作为当地权威的地位影响甚微，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当中，地方士绅力量的日趋强大正是皇权制度日渐削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32]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也没有根本改变地方士绅的权威和地位，这主要归结于伴随新政权的建立而出现的国家层面的问题。即使是民国初期地方割据、各自为王的军阀也必须和当地精英密切合作，否则就会不时遇到根深蒂固的精英们的抵抗。^[33]同样，日本侵华以后所建立的政权，包括1931年在东北及1937年以后在华北和华东各地建立的政权，都认可了地方士绅的权威，并通过他们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统治。^[34]

当然，这并不是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变革。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也就开始断断续续地、不平衡地向着现代化和工业化方向发展，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发展尤为突出。尽管面临着国家统一、抗日战争和内战等问题，中国也不仅发展了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还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展了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机制，包括学校、医疗服务、邮政服务、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行政机构。虽然这个阶段的社会分化的范围和规模都很小，而且高度集中于部分社会空间，但毕竟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了从事专业和管理行业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从事现代教育和大众媒体传播工作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些新现象和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普通老百姓偶尔也有机会加入经济精英的行列。^[35]

课题组访谈的企业家所描述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中定位。除了农民和工人（所占比例极小，但人数却在不断增长），拥有土地的统治阶层明显已经存在。1940年代，中国的四亿人口当中士绅人数还不到二百万^[36]，而且士绅的定义也不一定和中国共产党后来划分的地主阶级完全一致。正如黄先生和其他学者所述，许多所谓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其实为数很少，说不定还不如他们的佃户富裕。土地改革期间，决定一个家庭是否划为地主的标准常常不是客观条件，而是为了满足运动的指标。^[37]此外，如前所述，这期间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资本家、日渐增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被大批被招募参加抗日和内战的各种部队的军人。

1949年常常被看成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条重

要分界线，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这条分界线绝不意味着现在和过去一刀两断。以1949年为界，前后既有明显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其中有的连续性不仅延伸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而且还延伸到了1980年代。一种对于连续性的解释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政治的统一，但建国后的30年间却没有出现政治的稳定，30年的政治不稳定状态使人民回到他们所熟悉和信任的社会交往习惯和方式。^[38]还有一种解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带来了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以平均6%的增长率增长），但中国社会却没有出现世界其他地区所经历的社会分化。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力图实现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变得尤其重要。1950年代初，每个公民的家庭出身都是按其1946年至1949年间的经济来源而划分的^[39]，公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决定了他们在以后30年间的社会流动和生活机会。概括起来说，那些属于“红色”阶级的人，如农民、工人以及1949年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后代，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而那些属于“黑色”阶级的人，包括地主及其后代、资产阶级和反共分子，都面临不利生活机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以后，阶级身份的划分变得尤为重要。

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地方权力的结构也随之改变。中国政府不仅决定引入市场机制，并以此调节供需关系，甚至还放弃了对经济管理和控制的垄断权。这些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公平地说，改革过程中的确出现过些拖延和犹豫不决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具有市场经济管理能力的人才，另外也有人怀疑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是否是明智之举。新的改革措施所激发的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私有企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虽然社会分化分布不均，到199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出现了新的经济精英。

三、企业家和企业发展

企业的发展显然是分析新经济精英产生的关键所在。概言之，过去30年中所出现的企业不外乎有四种方式，区别方式的标准是企业最初的资本和

资源，而不是法定所有权。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企业按照其所有制分类，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均在国家计划经济规划范围之内，差异仅在于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不同。过去30年来，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不仅国有、集体、私营和个体企业继续并存，还出现了以股份制为基础的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企业所有制之间的重叠程度非常高。例如，有学者估计现有私营企业中约四分之一是从国有企业转化而来的，而国有企业也可以拥有私营企业高达一半的股份。^[40]

从历史上看，市场因素的引入和新兴企业的发展通常在农村地区开始，更加准确地说是城市周围和城郊的农村地区开始的。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集体经济的中流砥柱。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农村的经济活动和剩余劳动力直接相关，也可以说是其他形式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例如，在杭州，有一个村庄将一间以钢丝产品作为原材料的机械加工车间改造成一条生产出口至日本市场的精细礼品卡的生产线。他们的产品获得巨大成功，生产线很快发展成为大型工厂，该农庄随之停止了农业生产。山西省榆次的一个村庄将其农业机械车间改变成生产铝质散热器的工厂；被煤矿包围着的颍川（也在山西省）则特产多种煤炭副产品，特别是塑料。管理这些企业和领导企业发展的当地员工往往是以前的车间主任或能够在当地带动其他乡亲的领导成员。虽然严格说来他们只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而不是业主，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表现得如同拥有这些乡镇企业一样。

中国的国营企业也经过了类似的转变。以往，国家社会主义系统的特点是大规模的生产和经济效率的低下，自198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促使部分管理人员利用他们控制的资产追求新的机遇，其结果是国有资产以各种方式被开发利用。一家国有企业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单位往往会设立一个附属公司，以集体经营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自1990年代中期起，这些初期的改革进一步发展成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重组。一大批新的公有、私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公司破产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重组代替了以前的国有和集体企业。^[41]

例如，中国北方的一家钢铁厂，改组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单位，与其他大型的国有企业一样，这家钢铁厂既要满足大部分员工及其家属在社会和福利方面的需求，又要关注国家对其生产方面的要求。该企业有食堂，有给食堂供应蔬菜的农田，还有将农产品运送往食堂的卡车。改革开放前，没有人关注食堂和运输部门的低效率，因为食堂完成了每天给职工提供饮食的任务，而运输部门也完成了每天的运输任务。1980年代中期政策环境的改变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了显示他们管理才能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三种资源建立了三家公司，由该钢铁公司在名义上部分拥有这三家独立公司，但由以前工作单位的管理人员去分别管理和控制食堂、农田和车辆。母公司和这三家企业分别签订一份合同，由新的企业继续向母公司提供跟以前的服务，但为了生存，这三家新的企业将不得不在市场公开寻找另外赚钱的机会。

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组和新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私营企业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1980年代就开始运行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也获得了新的活力并得以扩展。私营企业活跃于所有工业和市场，包括采矿业和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加工、零售和服务行业。许多人只是个体户或者是小规模业主，但随着业务的增长，这些民营企业自然希望扩大生产，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政治资本的进一步投入。这也意味着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往往不得不转让一部分股权给当地政府以换取这些生产因素。正如乡镇企业和那些从国有部门及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演变而来的企业一样，这些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1980年代后期，杭州的一位车间技术员由于对单位不满而辞职单干，他认为，哪怕收入减少，给自己打工也会活得更开心。他搭起了不少蜂箱，开始生产蜂蜜，然后将蜂蜜卖给当地的餐馆和酒店。两年以后，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积累了一部分资金，于是他决定自己开餐馆，餐馆开得非常成功。3年以后，他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可用于投资新的项目。他想进入制造业，经过调查研究，他找到合适的产品，最终决定建立一家生产食品处理器的工厂。不幸的是，作为私营企业家，他没能向银行借到贷款，当地政府也拒绝了他建厂需要土地的申请。后来他按照当地政府的意愿与政府合作（让给

政府一半的股权)，建立一个新的集体经济企业，这样他的理想才得以实现。

现任安泰国际企业集团公司总裁兼总经理，山西省首富李安民早在 1984 年就在山西省介休县成立了一家生产焦炭的民营企业。他曾经是家乡村里的会计，用自己的 3000 元人民币，聘请了 27 个邻居。10 年之内，他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由当地政府和他的同村村民合资经营的集体股份公司。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该公司的经济活动已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水泥、服装和零售，从业人员达 3500 人。^[42]

第四种新企业成立的方式是通过国外投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范围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步放松，以至于虽然规章制度仍然繁多，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行业完全禁止外国投资。从山西省的牛奶到青海省的极品羊毛生产，从山西省交城和浙江省杭州的制造业到海南省琼山的零售和服务行业，只要有可资利用的机会，只要熟悉当地经济的人脉关系，就会有外国投资。有些令人不解的是，不管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私营企业，似乎没有一家公司因找不到国外合作伙伴而无法进行合资经营。这些吸纳海外投资的企业似乎有着同样复杂的所有制关系。虽然这些企业都由富于创业精神的管理人员管理，但这些管理人员往往不是企业创立理念的始作俑者。因此，对这些企业的产生或者创建作出特别贡献的创业者并非这些企业的业主。这与其他国家早期所经历的过程大不相同，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产权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43]，其结果是经济权力的关键在于对财富和控制，其意义远远超出法定产权。^[44]由此可见，新企业家是一个复杂而非简单的社会群体和概念，这个群体不仅包括私有经济的业主运营商，也包括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外商投资和外商独资公司的管理人员，曾经是民营企业企业家但如今却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家，以及其他种种时常令人困惑的混合体。

当然，并非所有过去 30 年间出现的新的创业者都是新的地方经济精英。有的企业家所办的企业完全失败了，有的企业家所积累的财富按当时当地的标准不算多，也有的企业家所追求的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和独立性。同时，在我们所访谈的对象中，有些新的企业家不只是达到

了小康的水平，还是当地的富豪和超级富豪。新的地方精英是那些控制和管理极大财富和资源的人士，他们自己也有着可观的个人财富和收入。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容易从访谈对象的个人收入和生活方式来辨别当地的经济精英成员。一条常规就是这些人的年收入至少是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 12 倍。

四、企业家的社会历史

在 2009—2013 年之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访谈的企业家在描述他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家境时，往往将他们的家庭背景归结到九类中的一类，即地主、资本家、管理人员、官吏、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和革命干部（1949 年前参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人）。他们在描述他们自己（有些访谈对象 30 年前就参加工作了）或他们的家庭在 1979 年的背景时，往往将其归结到新中国成立后定类的七类中的一类：干部、管理人员、职员、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军人。这些社会分层来源于访谈后的归类，而非事先定义。

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有关分类的问题。被访者在描述他们的父母时，描述的自然是在父母双方的两个家庭。在描述他们的祖父母时，则是以四个家庭开始的。除非被访者明确指出其母系家族方面的重要性，一般来说，父系家族方面的关系更为重要。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很容易对号就坐。唯一的例外是 1949 年的“老革命”或“革命干部”这一社会政治而非社会经济的群体。“老革命”一词由于中国在 1950 年的政治分类和以后 30 年的政治运动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词汇衍生于一系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政治分类（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等，所有这些都特指 1949 年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合并使用。“老革命”这一社会群体有时与其他社会经济范畴有所重叠，但在 1949 年家庭背景下“老革命”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特权。

将 1949 年和 1979 年的家庭背景结合起来考虑，理论上共有 63 种不同社会阶层的组合能使一个家庭在 2009 年成为地方经济精英的一员。但实际上，我们访谈的企业家几乎所有人的家庭出身都是“老革命”、农民或 1949 年时的统治阶级。跨越两代人通往 20 世纪地方精英地位最常见的途径共为六条，占全部被访谈者的五分之四：1949 年的

“老革命”——1979年的干部；农民——干部；地主——知识分子；“老革命”——管理人员；地主——农民。本文以下部分将分别描述这些社会历史的代表性案例，虽然有可能用两个不同代的家族轨迹来解释企业规模的差异（如大中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和不同行业的经济发展（零售还是服务行业，矿业还是制造行业等），但要作出肯定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一）1949年的“老革命”

606号企业家的父亲1949年参加革命，1979年的本人成分是干部。606号企业家是她家乡美容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在她所在区域不仅开了观感连锁整容诊所，而且还建立了培训学校。她父亲是1940年代参加革命的军人，在外地从军，五十年代初，党组织派他到606号企业家的家乡工作，与该企业家的母亲相遇并结婚。定居以后，他成了当地的领导干部。虽然他在文革期间遭受批判，但1970年代末获得平反并官复原职。

606号企业家就读于当地省城的医科大学，她毕业留校在附属医院的外科门诊部工作了几年，在此期间，她和一位同乡男子结婚。她丈夫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有两个孩子。606号企业家的丈夫在海外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在家乡投资开业。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化妆品公司，初期投资人民币六万元（1988年），目前（2010年）该企业年营业额已经达到60亿元人民币。

606号企业家为她的成就感到骄傲：“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只有3个人，现在雇了50个人。我需要照顾很多人、很多事。”她原是共产党党员（1985年），但后来停止交纳党费，最后组织非正式地告诉她，她的党籍已经过期。但她被选为当地的人大代表，并成功地争取到了更多的小学招生名额。另外，她还被选为省级的模范妇女，被政府视为发展化妆品行业的专家。

541号企业家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他父亲在1979年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出生于地主家庭，两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北方的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541号企业家的外祖父成为一家国有机械厂的厂长，而他的祖父则成为一个国有农场的领导。他父亲在1970年代后期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但他不是党员。541号企业家是四个孩子

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儿子，他1979年后出生，目前还是单身。他和他父亲一样，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541号企业家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他早在本科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他从事网上售鞋，但起初他也销售衣服。他不生产鞋，只为厂家提供了销售网点。刚开始的时候，他可以每月赚三千元左右。对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成功激励着他继续努力。毕业后，他返回老家，开了三家鞋店，在最繁华地段的那家投资人民币六万元，另外两家分别投资了三万和四万人民币。从此之后，他的销售网迅速扩展，分别在武汉、呼和浩特和本省的另外一个主要城市建立了连锁店，还在家乡开设了一间新店。他估计到2007年他的个人年收入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元。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他的发展计划受到了一些挫折，并导致他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网上销售。事实证明，他的网上销售计划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外，541号企业家还能够在他的家乡和其他地区开设新店铺。

304号企业家之所以被包括在这次访谈的名单中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关系。由于研究项目考察的一个地方是中山，我们预料到此地企业家极有可能有不少国际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出生海外、移民倾向、知识和经验的传播以及海外资金），已经完成的访谈证明了我们的预测。

304号企业家的祖父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但他的革命基地不在中国，而在马来西亚，他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员，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离开海南去马来西亚的。她的外祖父祖籍福建，起初是一个自行车修理工，后来自己拥有一间销售自行车的店铺。他又把自行车铺发展成大型家电店铺，橡胶种植园，棕榈树种植园，最后开办了一家棕榈油工厂。304号企业家的母亲是马来西亚华人，父亲是新加坡华人。1954年，为了响应毛泽东海外华人“回来建设祖国”的号召而移居中国，不过用304号企业家自己的话说：“爸爸到中国来是为了逃避兵役”。304号企业家的父母亲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在厦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厦门商业局工作。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不安定，304号企业家的父母亲于八十年代移居香港。她的兄弟姐妹现在都在香港定居。

尽管304号企业家生长在福建，父母又都是海

外华人，但她却自认为是海南人。她由一家服装公司起家，后来又拥有了另一家独立的公司，专门出版一份众所周知的时尚杂志，还管理一个慈善机构。304号企业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14岁就开始工作，1980年代她在叔叔的一家香港公司做蓝领工人。1986年，她在父亲任总经理的公司做秘书。1988年，304号企业家的叔父，一位马来西亚企业家，在中国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304号企业家成为该公司的营销经理。她说她叔父是对她的生活具有主要影响的人，她希望自己也能像她叔父那样，做个“纯粹的商人，完全不涉足政治”。1994年，她在现在的家乡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他们1997年结婚。丈夫以前是警察，当时正在转业做出口贸易，他和他的父亲（304号企业家的公公）都是中共党员。在她丈夫的鼓励下，304号企业家于2001年成立了一家服装公司，公司获得极大成功，所以到2004年她创办刊物的时候，能够自己解决五十万元的投资。304号企业家还开设了女性时尚沙龙，并从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例如，组织城市儿童捐出他们已经读过的刊物给农村儿童。

（二）1949年的农民

601号企业家的双方家庭在1949年都是农民。1979年，他的父母亲是国家干部。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他是家乡的一个主要房地产开发商。1980年代，他的父母都成了当地税务局的主要领导。1987年毕业以后，601号企业家也进入税务局工作，在税务局工作的七年时间里，他眼看着很多个体户赚了很多钱，而他的收入相形见绌，于是他辞去了工作，与几个朋友一起开始创业。2001年3月，他觉得独立创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投资一百九十万元建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从最初的九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公司也从一家到拥有数家子公司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公司，2009年的年销售额为二十亿元人民币。

601号企业家于1991年入党，当时他还在税务局工作，虽然他承认政府经常会提出一些非正式的建议来帮助企业，但他再三强调他和政府没有任何领导和财务方面的关系。“我不是当地人大代表，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是许多协会的成员，比如当地的民营企业协会和当地的房地产协会，我还是我们城市建设商务局的副会长。”601号企业家为自己能够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而感到自豪，他参

与的活动包括支持慈善事业步行募捐和筹款赈灾。他被党组织评选为模范党员，被当地政府评为模范企业家。601号企业家还担任“公共监督”这一从外部聘任的监督市工商局工作的职务，这一职务通常由商界知名人士担任，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公共管理的绩效，也是为了促进政府和商界的沟通。^[45]

308号企业家的背景与601号企业家有些相似之处。他的祖父1949年是个农民，但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1979年部队精简，他父亲被派往天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308号企业家那时已经搬到他现在的住地，也是他父亲服役的地方，他父亲是共产党员。他岳父也是党员，1979年任当地铁路局的部门主任，岳父的父母亲1949年被划为地主。308号企业家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其中3个跟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办事处，他们的年薪从7万元到20万元不等。

308号企业家是一家上市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公司的最大股东。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而308号企业家则是该单位的党委书记和主任。1994年，合作社转制成股份公司，员工可以持股。2001年，合作社从股份公司退出，并将其股份转售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308号企业家最初只有百分之七的股份，但他现在已占百分之三十，董事会其他成员占百分之四十五，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归其他个人。公司现拥有员工2500余人，市值“几十亿”元人民币。308号企业家的一个弟弟是设计师，2007年加入公司，现为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运作。

308号企业家于1985年入党，是他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他还是市工商联常委，市商会副会长以及市民营企业协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尤为值得308号企业家自豪的是，他作为人大代表关于市区建设地铁系统的提案已被通过。他被选为省、市级模范工作者、企业家和慈善家；被任命为市税务局、市人民法庭以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共监督”。308号企业家接受高等教育较晚，他1990年从市党校毕业，后来在家乡的一所大学完成了本科工商管理学位，后又在另一所大学获得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硕士学位。他在这第二所大学做了四年兼职讲师，最后于2009年从设在中国的瑞士维多利亚大学获取了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王海（320号企业家）于1941年生于农民之家，父母1949年还是农民，1979年，王海已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2009年，他被任命为青岛双星鞋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由日本人在1920年代初建立的，1949年后，该公司成为国有企业。1996年，公司改制，成为一家A股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人民政府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百分之八十为可交易股份，该公司目前拥有员工约三万。

王海出生于山东农村，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但他祖母的娘家却拥有土地。王海的哥哥1937年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王海也踏着兄长的足迹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成为中共党员。他们九个兄弟姐妹（五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当中，只有他和他的大姐是中共党员。王海的父亲也入了党。王海和他的妻子从小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年龄不大的时候就由媒人介绍结婚。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儿子是共产党党员。王海信佛，他请人在公司的青岛住宅小区里建了酷似自己的佛像。

（三）1949年的地主阶级

540号企业家的祖父和外祖父1949年均为主，一个住在省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另一个住在省城以南更远的县城。他父亲1979年是一个生产大队的会计，父母文革前都是村干部和党员，父亲曾担任他老家县里一个公社的“负责人”。540号企业家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高中毕业后，他离开县城去省城工作。他负责一家1995年成立的稀土合金生产厂的管理工作。1985年，他决定自己单干，经营废金属，并向一个朋友借了三百元人民币，向另一个朋友借了六百元人民币。他说他的目标一是积累一定数量的资金，二是每年都要更上一层楼。他承认：“一路过来困难重重，但有时候也时来运转。”1990年，他经营一个金属销售业务，做得非常成功。1995年，540号企业家有了新的想法，成立了一家硅—镁合金厂。工厂发展不错，但资金仍显不足。因此，他在2005年找了四个合资伙伴，重组公司，虽然他是该公司的小股东，却是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业务得益于国际和国内市场对他们产品需求的成倍增长，现在公司有数个膨胀罐（制造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在接受访谈时，他无法提供一个准确的企业资产，但估计在数十亿元人民币左右。

自1990年开始，540号企业家的妻子与他一起工作，任该公司的会计。他们有四个孩子，值得

他自豪的是，孩子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女儿是医学院的研究生，二女儿在天津大学就读，三女儿在一家师范大学就读，最小的儿子现在警察学院学习。

605号企业家的祖父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地主家庭。她1940年代末在私塾完成了旧式教育后离开家乡去寻找工作。605号企业家的父亲在1979年是一家船厂的高级工程师。605号企业家在她的家乡拥有好几家生产电子元件的工厂。虽然她是汉人，她丈夫却是来自广西的壮族人。丈夫的父母亲在1979年是村干部，和她的父亲一样，他们都是党员。

1979年高中毕业后，605号企业家成了家乡一家合资企业的工人，工厂由外商出资，生产电子设备。在工厂工作期间，她遇到了她的丈夫，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在她看来），她学到了必要的技能。1995年，她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生产用于打印机的电子电路，还有其他相关产品，如胶卷和油墨。之后，她扩大产品范围，除了打印机的电子电路产品之外，还生产其他电子设备，包括消防安全设备和激光打印机。605号企业家为她的能力和成功而感到自豪：“最初我成立公司的时候，公司既不符合政府法律上的要求，也不符合财政上的要求。我当时只有一万元人民币，而按照政策要求，注册一家公司至少需要七万元。我当时成功地注册了公司，但后来还得补交我答应了的六万元。”现在，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达四十亿元人民币。公司最初只有十二人，现在员工人数有好几百，并从生产电子元件发展到开发生产线。

1980年代中期，605号企业家继续她未完成的学业。她进入了当地的函授学院，学习商业管理。她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现在伦敦大学学习，女儿在当地的高中读书。605号企业家被选为地方和省级的模范企业家，并被聘任为市税务局、市工商和市公安局的“公共监督”。

五、结论与讨论

依据本研究的实地调查资料，我们可以就当今地方经济精英的家庭背景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流动模式做出一些假设。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尤为有力地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社会流动的程度和限制，虽然已有很多学者阐述了当今的领先企业家在中国经济中的突出表现，但我们访谈中所发现的企业家

的父母与党政体制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本项目的研究案例也进一步证实了其他论者所作出的结论：1949年的家庭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今后30年的生活机会。

当今，多数地方经济精英源于1949年时属于革命或者统治阶级的家庭这一事实或许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虽然我们没有在此举例说明，但有些企业家的家庭成员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地位。我们访谈的企业家的前辈（通常是祖父）包括一个1940年代后期的省长，一位著名的山西银行家和一位李宗仁的顾问。在革命家的前辈当中，有一位祖父曾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地方领导，后任贵州省委书记。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我们访谈对象的父亲）却没有参加共产党，而是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参与管理本地的经济事务。我们的调查也表明，被访谈的地方精英中有很多人的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同时属于老革命和统治阶层。

我们的访谈也发现，这些新的地方精英大多数是他们企业所在地的本地人；入党的人数比他们的父母少；大多数有一个以上的孩子，第一个孩子不是儿子的家庭往往会有多个孩子。尽管教育水平对发展高科技公司来说无疑十分重要，但总体来说，这个群体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精英显然很重视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往往会重返学校并回到大学担任兼职教师之职。与他们的知识基础较低形成对照的是，似乎多数企业家的家庭有着从商的经验。在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被访谈的企业家有着海外关系：有的家庭成员曾在海外生活并从事商务活动，有些甚至是在海外留学归国的。

鉴于这些结论是探索性的，较为妥善的做法是集中讨论新经济精英的家庭背景这一论题，而不是探讨更普遍的社会性流动。然而，有两点看法有必要阐述：其一是访谈过程中所披露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阶段，高层社会婚姻的政治性质。1950年代初是一个动荡不安、不断变化的年代。那么1949年以前的地主阶级试图通过婚姻来确保与新的革命精英的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拥有土地的家庭将其女儿嫁给共产党干部，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出生农民的普通军人也能娶到地主的女儿。这种政治婚姻甚至可能超出了高层社会。一位最近被访

的企业家的父亲的双方家庭在1949年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显然，如此家庭背景的原因之一在于政治婚姻。

第二点看法是有关地位和家庭的叙述。受访者不仅谈到了他们的直系亲属，还谈到了他们配偶（妻子和丈夫）的直系亲属以及某个家庭成员的经济活动。这些谈话均表明这些叙述有重要的参考依据。讨论岳父/公公和岳祖父/太公的时间差不多跟讨论父母和祖父母的时间一样多。有一位企业家谈到他的岳母时说：“她是上海的大家闺秀，她爷爷解放前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以前整个镇江路都是他们家的。”另一位企业家说他舅舅是他们省城的党委书记。还有一位谈及他妻子的祖父时说：“他是一个乡巴佬，娶了一个工程师的女儿，为当地的共产党员增了光。”这些谈话都表明，新的地方精英不仅重视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这些故事也说明了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可以实现目标。在访谈中，我们听到很多这种有关辉煌过去的故事。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这些家庭故事是否为个人行为的驱动力以及这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也强调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长期互动，这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近年的研究注重最近30年经济增长和发展期间的经济政治互动。访谈所呈现的要点在于，商业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实在不是什么新现象：当今地方精英的家庭历史证明了过去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这种密切关系始终都是存在着的。

就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问题而言，改革30多年来新经济精英的经验所提供的证据已趋明显：在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一直非常有限。195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进一步下降，并一直处于低水平。其后果之一是低层次的社会分化因党政机构的控制（社会阶层以及社会流动性）而得以巩固。反过来说，这个低层次的社会分化突显了新的经济精英的工作治理结构。与其分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如从“国家存在于社会”这一角度来分析两者的密切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最基层的地方经济精英基本上自我管理，因为虽然他们与当今政权有着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但他们的权势和权威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根源。

[参考文献]

- [1]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 [2]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3]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6 (1);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4] Stockman, Norman.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5] Sun Liping. *Fracture: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since the 1990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 [6] Huang, Philip C. *Misleading Chinese legal and statistical categories: labour, individual entit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Modern China*, 2013 (39).
- [7] Naughton, Barry.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8] Szelé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Outline of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inequality: The case of socialist and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Oi, Jean C. and Andrew Walder.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process of change*. Jean C. Oi and Andrew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 Krug, Barbara. *China's Rational Entrepreneu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London; Routledge, 2004.
- [11] Huang, Philip C. *China's neglected informal economy: reality and theory*. *Modern China*, 2009 (35).
- [12] Hsiao, Michael H M and Alvin Y So. *The making of the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the five propositions*. H. M. Hsiao (ed).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9; Goodman, David S G and Xiaowei Zang. *The New Rich in China;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change*. David S 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Routledge, London, 2008.
- [13] Dickson, Bruce J.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2004 (103);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4]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 Nee, Victor.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1); Nee, Victor.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ticized Capitalism in China*.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ws.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6 (22); Nee, Victor and Sonja Opper.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rug, Barbara and Hans Hendrichske. *Framing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Co-evolu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8 (1); Szelényi, Ivan. *A theory of transitions*. *Modern China*, 2008 (34).
- [15] Szelé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Outline of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inequality: The case of socialist and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onnell, Victoria E and Thomas B Gold (ed). *The New Entrepreneurs of Europe and Asia: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Vaduva, Sebastian, Bruce D

- Keillor, Michael d. Amico Emerging Entrepreneurship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Practice*, 2005 (3).
- [16] Szelényi, Ivan.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Rural Hung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McDermott, Gerald A. *The Embedded Politic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Network Restructuring . East-Central Europe*. Victoria E Bonnell and Thomas B Gold (ed). *The New Entrepreneurs of Europe and Asia: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Lengyel, Gyorgy.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Hungarian Small Enterprises Between 1993 and 1996*. Victoria E Bonnell and Thomas B Gold (ed). *The New Entrepreneurs of Europe and Asia: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 [17] Beatriz Carrillo, Minglu Chen, and David S G Goodman. *The New Rich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social basis of local power, support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 [18] Tsai, Kellee S.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Wright, Teresa.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9] Chen Minglu . *Tiger Girls: Women and Enterpri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 [20] Goodman, David S G. *The Localism of Local Leadership: Cadres in Reform Shanx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24).
- [21]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Saich, Tony and Biliang Hu. *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New Coll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22] Whyte, Martin King.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144); Whyte, Martin King .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6 (1).
- [23] Exceptions include Goodman, David S G. *Why Women Count: Chinese women and the leadership of reform*. *Asian Studies Review*, 2002 (3); Pistrui, David, Wilfred V Huang, Harold P Welsch and Zhao Jing . *Family and Cultural Forces: Shap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 Development in China*. Paninkos Poutziouris, Kosmas, and Sabine Klei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Family Business* Edward Elgar, 2008.
- [24] Selden, Mark. *Family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in rural north China*. 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 (ed).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25] Perry, Elizabeth J .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 Manion, Melani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earning from Local Sampl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
- [26]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6 (1).
- [27] Watt, John R. *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8] Stockman, Norman.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29]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30] Wong, R B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Legacy of the Late Imperial past*. Deborah S Davis and Wang Feng (ed).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1] Ho, Ping-Ti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 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32] Levenson, Josph . *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33] Gillin, Donald G .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 – 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Jiang Shunxing and Li Liangyu (ed). *Shanxi wang Yan Xishan*. Henan renmin chubanshe, 1990.

- [34]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5] Bergère, Marie-Claire.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Paris: Flammarion, 1986.
- [36] Chang Chi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0.
- [37] Huang, Philip C. *Analyz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 *Modern China*, 1975 (2); Huang, Philip C.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995 (1).
- [38] Lieberthal, Kenneth.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9] Kraus, Richard Curt.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40] Dickson, Bruce J.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1] 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2006 (55).
- [42] Liu Liping et al (ed).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 in China-Shanxi*. Beijing: Worker press, 1989.
- [43]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 and Growth*. MIT Press, 2007.
- [44] Oi, Jean C. and Andrew Walder.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process of change*. Jean C. Oi and Andrew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5] Chen Minglu. *Women, enterprises and the state*. John Garrick (ed). *Wealth, Power and Law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New Economic Elites: Family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David S G Goodman

(Department of China Studies,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PRC;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PRC)

[Abstract] In describ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elites in China since 1978, the weight of evidence has been placed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planations. Ver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in particular family, in shap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is paper reports on research currently being conducted in Kunming, Lanzhou, Nanjing, Qingdao, Taiyuan, and Zhongshan at least in part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family influences. In particular, it has been concerned to examine economic elite formation historically by enquiring about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 in both 1979 (usually parents) and 1949 (usually grandparents).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back to before 1949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nomic elites of 2009;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new economic elites have parents in the party-state, and grandparents in the pre-1949 ruling cla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narratives to individual behavior.

[Key words] market configuration; new economic elites; family background; family history; social change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